

塞内加尔民主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探源

——国家与社会的双重视角*

孟 瑾

内容提要 在非洲国家普遍实行多党民选制度的背景下，“逢选易乱”是影响非洲国家政治与安全局势的痼疾，而塞内加尔是西非地区唯一没有发生过军事政变的国家，被西方誉为非洲国家民主化的“成功典范”。究其原因，国家与社会在塞内加尔民族独立和国家建构过程中形成的较为良性的互动关系是塞内加尔政权稳定的根本因素。从自上而下视角看，塞内加尔政府主动启动政党制度改革，建立强有力的权力中心，并在政治发展中不断强化政治整合能力，巩固政府权威，这是稳定国家政治秩序的有力保障。从自下而上视角看，以苏非兄弟会为中心的伊斯兰教组织架构发挥着“社会黏合剂”的作用；较为成熟活跃的社会组织通过表达社会诉求、增强社会融合，推动着塞内加尔民主化进程。与此同时，内嵌于国家与社会中的政治和社会文化为塞内加尔政治稳定创造了有利条件；政治精英的思想和实践塑造着开放包容、改革探索的政治文化；相对统一的社会构成和国家政策的民主导向有助于形成和谐共处的社会氛围。当下，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萨赫勒地区宗教极端主义不断渗透带来的内外压力，塞加内尔政府需要采取措施以继续维护国内政治与社会稳定。

关键词 塞内加尔 政治稳定 政党制度 苏非兄弟会 社会组织 政治文化

作者简介 孟瑾，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101）。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中国‘和平’理念的内涵及其在西非法语国家中的实践”（2020YQNQD00127）阶段性成果。感谢《西亚非洲》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非洲国家基于殖民遗产、民族国家建构的弱质性等多重原因，社会骚乱、暴力冲突、军事政变等政治动乱并不鲜见。尤其是伴随着非洲“民主转型”而产生的选举冲突，“逢选易乱”现象时有发生。而西非重要国家塞内加尔是少数在冷战结束前确立多党制的非洲国家之一，并且是唯一没有发生过军事政变的西非国家。自独立以来，塞内加尔政府主动启动政党制度改革，从一党制逐渐过渡到多党制，确保了国家政权的平稳更迭。而且，塞内加尔还确立了强有力的权力中心，并在政治发展中不断巩固。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使塞内加尔被西方学者视作非洲国家民主化的“成功典范”^①和“准民主国家”的代表。^②以制度与国家为中心、从自上而下视角认识塞内加尔政治生态，仅是民主政治的显性层面，往往忽略了非国家行为体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作为塞内加尔社会力量的代表，伊斯兰教和世俗性质的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政治生活，通过与国家机构或制度的互动参与民主化进程，为观察塞内加尔民主政治提供了自下而上的视角。与此同时，以桑戈尔为代表的政治精英的思想体系和较为同质的社会构成，使包容和谐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内嵌于塞内加尔的政治发展中，成为政治稳定性的有力保障。诚然，影响一国政治稳定性的因素颇多，而本文则将政治稳定置于民主化进程之中，通过国家与社会视角，聚焦有效政治制度的构建、社会组织的政治参与、内嵌的政治与社会文化三个方面，分析造就塞内加尔政治稳定的因素。

尽管塞内加尔民主政治在非洲国家中具有一定特殊性和代表性，但国内学界以塞内加尔民主政治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述较少^③，有关塞内加尔社会对政治发展影响的研究也大多仅限于伊斯兰教而尚未涉及世俗性质的社会组织。^④

^① Christian Coulon and Donal Cruise O'Brien, "Senegal", in John Dunn and Richard Rathbone eds., *Contemporary West African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45-164.

^② See Leonardo A. Villalón, "Democratizing a (Quasi) Democracy: The Senegalese Elections of 1993", *African Affairs*, Vol. 93, No. 371, 1994, pp. 163-193; Richard Vengroff and Lucy Creevey, "Senegal: The Evolution of a Quasi Democracy", in John F. Clark and David E. Gardinier eds., *Political Reform in Francophone Africa*, Boulder: Routledge, 1997, pp. 204-222.

^③ 参见王涛、黄世顺：《稳定可控的塞内加尔政治发展》，载张宏明主编：《非洲发展报告（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09~229页；孟瑾：《塞内加尔政党制度演变及其特点》，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年第6期，第138~145页。

^④ 田逸民、杨荣甲：《伊斯兰教在塞内加尔的影响》，载《西亚非洲》1983年第5期，第47~50页；李文刚：《浅析塞内加尔的伊斯兰教及其对政治变迁的影响》，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4期，第50~58页；方圣兰：《苏非兄弟会在塞内加尔社会契约中的角色研究》，载《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2019年第1期，第26~35页。

传统精英在塞内加尔政治动员中的作用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但是相关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基层社会的能动性及其对传统和政治权威的反作用力。^① 将国家与社会视角结合并探究两者在塞内加尔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互动关系是本文力图创新之处。此外，对塞内加尔民主政治的研究亦是深入开展中非合作的切实需要。塞内加尔不仅是“一带一路”倡议在西非地区的重要支点，而且是中国深化与法语非洲国家合作的突破口。作为2021年中非合作论坛共同主席国，塞内加尔将在中非关系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因此，对塞内加尔政治制度的认识和社会机理的把握是全面深化中塞合作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塞开展治国理政交流、共同探索多元化发展道路的必要前提。

一 自上而下有效政治制度的构建与调适

塞内加尔独立后，该国领导人主动推行政党制度改革，成为少数在冷战结束前确立多党制的非洲国家之一。较早确立的多党制有效缓解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带来的冲击，为进一步民主转型奠定了基础。塞内加尔政权模式在独立后不久由议会制转型为总统制。建立强有力的权力中心有利于避免政治分裂，为稳定国家政治秩序提供了保障。在塞内加尔政治发展中，执政党不断强化治国理政能力，巩固政府权威，维护着塞内加尔政治稳定。

（一）主动启动政党制度改革

政党制度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环节，也是政治稳定的一大支柱。塞内加尔政党制度经历了由“统一”政党（事实上的一党制）转为“有限多党制”，再到全面开放多党制的演变过程。这一转型过程是塞内加尔政府基于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主动推行的改革，使塞内加尔提早适应了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席卷非洲的民主化浪潮，避免了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出现激烈的社会动荡或军事政变，为塞内加尔日后的民主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1960年8月，塞内加尔国民议会通过了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尽管该宪法没有规定实行一党制，但是桑戈尔领导的塞内加尔进步联盟（Union

^① 魏翊：《国家建构策略与政党政治动员——当代非洲政党制度化的政治起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3期，第53~74页。

progressiste sénégalaise) 在 1963 年国民议会选举中获得了所有席位, 并得以掌控国家机构所有部门, 处于绝对统治地位。^① 1964 年政府出台相关法律, 规定所有政党必须向内政部申请才能组织活动, 政党活动受到严格的法律限制。^② 直至 1966 年底, 所有反对党或被勒令禁止或被合并而不复存在, 塞内加尔成为事实上的一党制国家。^③

塞内加尔独立初期实行一党制有利于巩固新生政权, 维护政局稳定, 防止政治斗争和社会割裂。但是, 随着经济下行带来的民生艰难, 民众将经济困境的根源指向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 桑戈尔政权的合法性遭到质疑。另外, 1968 年, 法国因经济发展放缓、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而爆发“五月风暴”。由于塞内加尔精英与法国社会接触紧密, “五月风暴”对塞内加尔社会产生刺激作用。1968 年和 1969 年, 塞内加尔大学生和工会组织在主要城市组织抗议运动, 表达对桑戈尔政府政治、经济政策的不满。城市运动对农村产生溢出效应, 花生成交价走低、连年干旱气候加剧了农民对政府的不满, 社会矛盾集中爆发, 政治改革迫在眉睫。鉴此, 桑戈尔考虑实行政治民主化改革, 允许其他政党合法存在并参与选举。

桑戈尔从 1974 年起逐渐放松政党禁令, 赋予其他政党一定的合法性。1976 年 3 月修订的宪法开始承认两个反对党的合法存在, 即瓦德 (Abdoulaye Wade) 领导的塞内加尔民主党 (Parti démocratique sénégalais) 和马杰姆·迪奥普 (Majhemout Diop) 领导的非洲独立党 (Parti africain de l'indépendance)。同年, 塞内加尔进步联盟更名为塞内加尔社会党。1978 年, 国家再次修订宪法, 赋予塞内加尔共和运动党 (Mouvement républicain sénégalais) 合法性, 政党数量扩大至 4 个。至此, 塞内加尔成为多党制国家, 但由于对反对党数量上有所限制, 因此它是“有限多党制”。^④ 1978 年, 塞内加尔举行了 1963 年以来第一次有反对党参加的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尽管桑戈尔再次赢得总统选举, 但

① 桑戈尔始终强调宪法容许反对党在与执政党目标一致的前提下表达建设性意见, 认为塞内加尔进步联盟不是唯一政党 (parti unique) 而是“统一”政党 (parti unifié)。

② Amady Aly Dieng, 《Situation économique, politique et sociale du Sénégal》, dans Amady Aly Dieng (dir.), *Le Sénégal à la veille du troisième millénaire*, Paris, l'Harmattan, 2000, p. 382.

③ Donal Cruise O'Brien, “Political Opposition in Senegal: 1960 - 67”,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 2, No. 4, 1967, pp. 557 - 566.

④ Robert Fatton Jr., *The Making of a Liberal Democracy, Senegal's Passive Revolution 1975 - 1985*, Boulder&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87, p. 7.

是塞内加尔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了100个席位中的17个，打破了社会党的政治垄断。反对党在议会中占有席位在当时的非洲国家中尚属罕见。^①

1980年12月，桑戈尔总统审时度势主动引退，将职务移交给时任总理迪乌夫（Abdou Diouf），成为非洲大陆首位在任期内主动辞去总统职位的国家领导人。迪乌夫上任后决定全面放开党禁，以巩固民众支持、分化势力日益强大的塞内加尔民主党。1981年4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取消了对政党的数量及意识形态的限制，仅规定政党必须在宪法的框架内活动。^②至此，塞内加尔成为全面多党制国家。

塞内加尔实现了由一党制向多党制的转变，顺应了民众和反对派对政治参与和政治开放的需求。由于这一转变是执政党基于国内外形势主动推进的政治改革，执政党对政治改革的节奏和程度有着基本把控，确保了这一进程的稳步进行。一党制向多党制转变的过程是塞内加尔领导人和民众探索符合自身历史、现实国情的政治制度的过程。尽管这一过程受到外部因素和殖民历史的影响，但更多是塞内加尔本土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为塞内加尔多党制付诸实践奠定了基础。

（二）建立强有力的权力中心

塞内加尔在独立初期试图通过宪法确立双元首议会制。双元首议会制理论上能够实现权力间的相互制衡，避免权力个人化。但是事实上，刚刚独立不久的塞内加尔仍亟需通过强有力的政府来巩固政权，双元首议会制因不利于权力的集中而最终破产。塞内加尔于1963年通过宪法确立了总统制，之后多次修宪也没有触动以总统为行政权力中心的政治体制。

1960年新宪法规定塞内加尔实行双元首议会制，即总统和总理都被授予广泛的职权，分享行政管理权，共同对立法机构国民议会负责。双元首制下同样强势但政见对立的总统桑戈尔和总理马马杜·迪亚（Mamadou Dia）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1962年12月，两股政治势力的角逐以迪亚的被捕判刑为终。政治危机平息后，塞内加尔于1963年3月7日经公民投票通过了又一部新宪法。新宪法废除了总理职位以及议会弹劾政府的权力，规定总统独揽国家行政大权。自此，塞内加尔由议会制转变为总统制。

^① Babacar Kanté, "Senegal's Empty Election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5, No. 1, 1994, p. 98.

^② Gerti Hesseling, *Histoire politique du Sénégal*, Institution, droit et société, Paris, Karthala ASC, 1985, p. 290.

直至1999年,1963年出台的宪法经历了近20次修改,修改内容涉及机构设置和职能、总统任期年限等方面,但宪法的基本框架没有被触动。^①2000年,民主党领导人瓦德在总统选举中胜出,政权由社会党移至民主党手中。独立40年来,塞内加尔首次实现了党际政权更替,进一步巩固了多党民主的体制。^②社会党的长年执政造成了权力过于集中、财富分配不均等结构性问题。大多数民众认为政治体制是多年来积攒的经济社会矛盾的根源,改革派呼吁彻底废除1963年由桑戈尔创立的、20年来由迪乌夫巩固的宪法框架,主张建立以社会契约和政治参与为基础的新秩序。^③因此,通过新宪法实施政治体制改革成为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瓦德就任总统后,于2001年1月7日经全民公决通过后颁布新宪法。然而,新宪法的延续性远远大于变革性。^④尽管新宪法将总统的部分行政权力移交给总理,并且限制了总统任期,但总统保留解散议会的权力,议会的权力限于名义上对内阁的决定有批准权,总统制得以保留和加强。

塞内加尔由议会制向总统制的转变是探索符合其社会现实的政权模式的过程。在一国进入现代化转型阶段后,拥有有效的统治能力则是推进政治发展的前提。塞内加尔通过确立以总统为中心的“强政府”来维护社会的良好秩序。在塞内加尔的权力结构中,总统主导着权力分配和国家政策导向,利用手中权力更有效地践行政府制订的各类经济与社会发展政策。这种强有力的政权形式使政治力量得到了整合,防止出现行政机构内部的政治分裂。

(三) 强化执政党的政治整合能力

确立多党制之后,执政党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灵活务实地处理与反对党之间的关系,通过政治笼络和政治吸纳缓解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的矛盾,分

^① Ismaïla Madier Fall, *Évolution constitutionnelle du Sénégal, de la veille de l'indépendance aux élections de 2007*, Yaoundé, Karthala et Crepos, 2009, p. 13.

^② Momar Coumba Diop et al., *« Le baobab a été déraciné. L'alternance au Sénégal »*, *Politique africaine*, Vol. 2, No. 78, 2000, pp. 157 - 179; S. M. Sy, *L'alternance politique au Sénégal, la Constitution et les valeurs*, Paris, Dalloz, 2005, pp. 593 - 609.

^③ Momar - Coumba Diop, *« Le Sénégal à la croisée des chemins »*, *Politique africaine*, Vol. 4, No. 104, 2006, p. 104.

^④ Tarik Dahou et Vincent Foucher, *« Le Sénégal, entre changement politique et révolution passive. 'Sopi' or not 'Sopi' ? »*, *Politique africaine*, Vol. 4, No. 96, 2004, pp. 5 - 21.

散和削弱反对党的实力。^① 例如，在1991年4月的内阁调整中，迪乌夫任命瓦德以及其他反对派领导人担任重要部长级职务，以削弱和稀释反对派力量。再如，在1993年竞选期间，候选人瓦德和其他反对派领导人因质疑和攻击执政党政策及合法性而被软禁。但为了争取政治支持，弱化反对派力量，迪乌夫政府于1995年3月再次邀请瓦德入阁。^② 政治吸纳策略在分化反对党力量的同时削弱了执政党的凝聚力，使社会党内部日趋分裂。瓦德领导的第一大反对党民主党羽翼日益丰满，于2000年总统选举中通过以“改变”为竞选口号赢得大选。随着多党制全面发展、民主开放程度的提高，塞内加尔政党呈现出碎片化发展态势。创建政党成为政客争夺政治资源、获取经济利益的主要方式。2011年，塞内加尔注册有174个政党。当下，塞内加尔政党数量已突破300个。^③ 在新的政党格局下，政党联盟成为整合政党力量的有效渠道。由于政党之间不存在根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潮差异，这为政治力量的联盟与重组提供了便利。在2012年总统选举中，争取共和联盟（Alliance pour la République）候选人马基·萨勒（Macky Sall）在决选阶段通过联合其他在野党组成共同“希望联盟”（沃洛夫语，Benno Bokk Yakaar）打败了瓦德，成为塞内加尔新一任总统。萨勒总统在任期间推出“振兴塞内加尔计划”，通过一系列经济发展政策赢得民众支持，巩固了争取共和联盟的优势地位，于2019年2月得以连任。可见，多党制下的党际竞争并不意味着民众利益的代表性得到增强，政治权力容易成为各政党换取政治利益的筹码，从而使公共资源遭到“绑架”。^④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塞内加尔执政党主动承认反对党的合法性并允许其参政议政体现出塞内加尔相对开放的政治生态，为平稳有序推进塞内加尔民主化进程创造了条件。

（四）巩固政府权威

巩固政府权威并不意味着实行专制独裁，而是要把传统权威转变为以理性和法律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权威。由于总统掌控大部分权力，重要的修宪议

^① Antoine Tine, *Essai sur le multipartisme au Sénégal*, Polis/RCSP/CPSR, Vol. 3, No. 1, 1997, pp. 61 - 105.

^② Christian Coulon, 《La démocratie sénégalaise: bilan d'une expérience》, *Politique africaine*, No. 45, mars 1992, pp. 3 - 8.

^③ Catherine Lena Kelly, *Party Proliferation and Political Contestation in Africa, Senegal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20, p. 3.

^④ Linda J. Beck, *Brokering Democracy in Afric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 49 - 68.

案皆由总统提出，修改宪法成为当政者应对政治危机、调整权力分配的工具，进而构成塞内加尔政治稳定的又一原因。^① 塞内加尔是非洲国家修宪最频繁的国家之一。1960年该国宪法经历了两次修改，1963年宪法经历了19次修改，2001年宪法至2020年已经历了17次修改。^② 频繁修宪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权力机构设置的延续性，但同时也成为化解矛盾的工具和手段。例如，为回应1968年大规模社会运动提出的政治改革诉求，桑戈尔于1970年修改宪法，重设总理职位，限定总统任期，以限制总统权力，有效缓解了社会压力。2012年9月，萨勒总统上台后立即通过修宪废除了被民众认为过于耗费财政开支的参议院，赢得了民众支持。此外，塞内加尔通过修宪对执政党与在野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及时进行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统治权力、缓和了紧张的社会关系，如1976年、1978年、1981年的宪法修改使塞内加尔循序渐进地完成了向多党制的转型。1996年3月，该国再次修宪，推行地方分权，将行政职权下放至区、县、乡。

与此同时，修宪也是维护领导人统治地位、换取政治支持的工具和分化反对派力量、排除竞争对手的手段。1998年，为了扩大自身阵营实力，迪乌夫总统通过修宪设置参议院安置支持其政治立场的盟友。2008年，瓦德为消减竞争对手萨勒的威胁，通过修宪缩短了国民议会议长的任期，免除萨勒国民议会议长职务。2019年5月，萨勒总统通过修宪废除总理职位，再次凸显了塞内加尔的强总统格局，避免了2022年议会选举中反对党若获得多数席位提名总理的可能性。^③ 可见，塞内加尔修宪很大程度上由总统主导，具有一定的个人色彩。塞内加尔历史上的修宪并不总是基于民主导向的理性逻辑，其效果或巩固或削弱了塞内加尔民主政治。但是，修宪已作为权力分配或重组的方式，为塞内加尔维持稳定创造了条件，使执政党和反对派都倾向于通过

^① Melissa A. Thomas and Oumar Sissokho, "Liaison Legislature: the Role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in Senegal",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43, No. 1, 2005, pp. 97 - 117; Kanté Babacar, 《Le Sénégal: un exemple de continuité politique et d'instabilité constitutionnelle》, *Revue juridique, politique et économique du Maroc*, No. 22, 1989, pp. 145 - 160.

^② Ismaila Madior Fall, "Constitutional Revisions, Democracy, and the State in Senegal", in Leonardo A. Villalón and Rahmane Idrissa eds., *Democratic Struggle,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State Resilience in the African Sahel*,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20, p. 72.

^③ Manon Laplace, 《Sénégal: la révision de la Constitution adoptée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Jeuneafrique*, 5 mai 2019, <https://www.jeuneafrique.com/770954/politique/senegal-la-revision-de-la-constitution-adoptee-a-l-assemblee-nationale>, 2021-02-13.

渐进式改革以平稳妥协的方式实现政治制度的调整和权力的分配，而不是激进的政治对抗来巩固或获取统治地位。

二 自下而上社会组织政治参与

以制度与国家为中心认识塞内加尔政治生态，是民主政治的显性层面。然而，政治制度并非政治生活的全部内容。如果仅从国家自主性的视角来解释政治过程，就不能对国家的行为进行有效的解释。^① 社会组织的政治参与是考察塞内加尔民主政治的重要方面，宗教组织和世俗社会组织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为认识塞内加尔民主政治提供了自下而上的分析视角。

（一）苏非兄弟会的“社会黏合剂”作用

塞内加尔95%以上的民众信仰伊斯兰教，其中大部分信奉温和、包容的苏非教义。伊斯兰教于11世纪传入塞内加尔，起先主要在富塔—托洛地区（Fouta-Toro，即塞内加尔河两岸地区）传播，当时仅受到王室家族的信奉。直到17世纪和18世纪，普通百姓才开始逐渐接触伊斯兰教。19世纪末，以苏非兄弟会为中心的伊斯兰教组织体系逐渐建立。^② 塞内加尔伊斯兰教是伊斯兰苏非教义和非洲政治哲学融合的产物，大多数信徒并不拘泥于教士（Ulama）制定的严格教规。对宗教领袖马拉布特（Marabouts）的尊重和敬仰是宗教崇拜的实现途径和主要媒介。^③ 伊斯兰教不仅渗透至塞内加尔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而且塑造着塞内加尔的政治生态。伊斯兰教导师不仅因为精通伊斯兰教教义而成为“神的使者”（hommes de Dieu），而且作为先知穆罕默德在世俗社会的代表，通过其宗教和政治的双重身份发挥着确保社会稳定运转、维护社会正义的作用。从法国殖民统治时期到塞内加尔民族独立后，以苏非兄弟会为基础架构的伊斯兰教管理体系灵活地适应了塞内加尔经济、政治和社会变迁，在倡导建设发展型国家、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今天，苏非兄弟会作为动员社会力量、协调社会关系的渠道依旧发挥着重要的“黏合剂”作用。

^① 程同顺、高千：《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另类阐释——〈社会中的国家〉评述》，载《国外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第139页。

^② Mouhamadou Mansour Dia, 《L'administration coloniale française et la consolidation de l' Islam confrérique au Sénégal》，*Histoire, Monde et cultures religieuses*, Vol. 4, No. 36, 2015, p. 108.

^③ Christian Coulon, *Le marabout et le prince, Islam et pouvoir au Sénégal*, Paris, Pedone, 1981, pp. 6-7.

第一，马拉布特的政治支持是树立和巩固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殖民早期，苏非兄弟会重要领导人因抵抗法国侵略而遭受殖民统治者软禁或放逐。^① 进入 20 世纪，殖民政府逐渐意识到他们无法削弱宗教领导人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开始倚重马拉布特以实现“间接统治”。^② 殖民政府对伊斯兰教的传教活动采取中立态度并保留了伊斯兰教以苏非兄弟会为基础的内部架构，利用马拉布特“中间人”独特的作用降低殖民统治的人力和财力成本，维护殖民地社会稳定，树立殖民统治的合法性。^③ 经济上，法国殖民者利用马拉布特的影响力发动教徒大范围种植花生，满足了本土对植物油的需求，将塞内加尔卷入殖民经济体系。政治上，殖民者通过赢得马拉布特的支持和信任树立了广泛的合法地位，利用其威望和影响力加强了对农村地区的管理，马拉布特成为殖民统治势力由“中心”深入“边缘”的“传送带”(courroie de transmission)。^④ 在帮助殖民者实现殖民统治的同时，马拉布特赢得了殖民者对其宗教信仰的承认和尊重，并获取殖民者对其个人及教徒群体的政治支持和物质资助。因此，殖民统治者与马拉布特之间的关系是实用主义性质的，以双方掌握的不同物质和社会资源的互补性为基础。在这种互动关系中，殖民统治者树立了其统治的合法性，而马拉布特则在实现经济利益的同时，加强了在教徒中的声望和影响，成为宗教和行政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塞内加尔独立后，马拉布特的政治立场依旧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塞内加尔的政治版图。尽管塞内加尔采取政教分离制度，但是宗教力量继续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政治统治势力和宗教力量的联合得以延续，其原因是二者的资源互补性依然存在。在代议制民主背景下，马拉布特通过对信徒发布宗教指令(ndiggël)来影响其投票行为，成为各政党争取选票的重要选民(grands électeurs)。政党利用马拉布特在信徒中的影响力获取政治支持。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马拉布特不再通过宗教指令直接左右信徒的政治选择，但是其政治立场依然是选民表达政治意愿的重要参考。赢得宗教领导人的支持仍是

① Ibrahima Mbengue, *La saga de l' Islam au Sénégal, Islamisation et dés - islamisation*, Dakar, L' Harmattan - Sénégal, 2020, p. 92.

② Cheikh Anta Babou, "The Senegalese 'Social Contract' Revisited", in Mamadou Diouf ed., *Tolerance, Democracy, and Sufis in Senega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28.

③ Donal Cruise O' Brien, "Renegotiating the Senegalese Social Contract", in Donal Cruise O' Brien ed., *Symbolic Confrontation: Muslims Imaging the State in Africa*, New York: Palgrave, 2003, pp. 193 - 213.

④ Christian Coulon, *Le marabout et le prince, Islam et pouvoir au Sénégal*, p. 166.

政府拉拢人心、巩固政权的重要保障。桑戈尔总统在位期间与苏非兄弟会之间建立的庇护关系确保了社会的稳固性和社会党的统治地位。^① 迪乌夫继任后试图通过民主化改革来缓和社会矛盾，对马拉布特的政治地位造成了冲击，但是政府与马拉布特共同的利益基础没有被撼动。^② 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经济衰退，社会不满情绪高涨，民众开始质疑政权合法性，马拉布特也逐渐与统治集团拉开距离。自1990年起，主要宗教领袖不再公开对政治问题进行明确表态。权力的天平慢慢倒向反对党民主党。^③ 国家政权最终在2000年由瓦德领导的民主党接替，但是政治权力与宗教势力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弱化。瓦德总统继续通过倚重与苏非兄弟会所属的穆利德兄弟会的关系来巩固其统治地位，因而被称为“穆利德的总统”。^④ 2012年上任的萨勒总统避免宗教人士过多地参与政治的同时肯定马拉布特在协调社会关系中的作用。^⑤

第二，马拉布特连接着国家管理层和社会草根阶层，发挥着“安全阀”作用。塞内加尔独立后，马拉布特与殖民政府之间的依存关系作为殖民遗产延续下来，成为新独立国家与民众之间建立的“社会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⑥ 马拉布特以政治支持为筹码，从政府获取物质利益和政治经济特权。例如，马拉布特要求政府为修建清真寺提供财政支持，抬高花生收购价格，重视和推广阿拉伯语教育，充分尊重宗教节庆和仪式，优先为马格拉布安排政府职位等等。^⑦ 马拉布特通过对这些利益和特权的再分配来满足信徒的诉求，进而赢得后者的信任。

随着塞内加尔社会构成的持续变化，宗教首领与信徒、政府之间的关系

① 宗教领袖与政治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也出现过波动。如1968年后，桑戈尔与新任宗教领袖塞兰·阿卜杜·拉哈特（Serin Abdou Lahat）关系出现恶化，后者曾有意疏远与政府间关系。

② Lucy E. Creevey, “Muslim Brotherhoods and Politics in Senegal in 1985”,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23, No. 4, 1985, pp. 715–721.

③ Momar Coumba Diop et Mamadou Diouf, *Le Sénégal sous Abdou Diouf. Etat et société*, Paris, Karthala, 1990, pp. 320–325.

④ Abdourahmane Seck et al. (dir.), *État, société et Islam au Sénégal, un air de nouveau temps?*, Paris, Karthala, 2015, p. 23.

⑤ 为限制宗教领导人特享有的政治特权，萨勒总统上台后收回了部分马拉布特的外交护照。“Macky traque les passeports diplomatiques des marabouts”, *Xalima*, 27 juin 2012, <https://www.xalimasn.com/macky-traque-les-passeports-diplomatiques-des-marabouts>, 2021-03-17.

⑥ Donal Cruise O'Brien, 《Les négociations du Contrat Social Sénégalais》, dans Donal Cruise O'Brien et al. (dir.), *La construction de l'Etat au Sénégal*, Paris, Karthala, 2002, pp. 83–94.

⑦ Moriba Magassouba, *L'islam au Sénégal, Demain les mollahs?* Paris, Karthala, 1985, p. 121.

也有所调整，但是马拉布特作为政权合作者和民众利益代表的双重身份没有改变。穆斯林曾以从事花生种植的农民为主。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贸易活动的日益频繁，城市商人开始成为穆斯林的主体。与此同时，海外穆斯林数量增加，他们以其相对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持苏非兄弟会活动，提高了苏非兄弟会的财政自主性。另外，随着社会开放程度和民众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广大穆斯林能够更加独立地思考和分析国家政策，不再盲目听信和追随宗教领袖的政治意愿。他们在宗教事务上接受宗教首领的指导，而反对马拉布特过于介入国家政治事务。^① 为了维护其社会威信，宗教领袖也试图与统治集团保持距离，有意抵制后者的利益诱惑。此外，随着苏非兄弟会领导人的代际交替，马拉布特人数不断增加并且呈年轻化的趋势。这些“新生代”马拉布特形成了新的零散的权力中心，尽管其影响力与传统马拉布特不可同日而语，但是通过创建宗教性质社团、利用媒体平台等新形式占据公共空间，增强政治影响力。这些形式打破了传统的“导师—教徒”关系，使宗教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更加灵活。但是，这些新变化只是苏非兄弟会组织方式的改变，马拉布特依然具有宣传政策、传导民意的有效作用，其连接国家管理层和社会草根阶层的社会纽带作用没有被削弱。例如，国家和政党领导人经常到圣城蒂瓦瓦内（Tivaouane）、图巴（Touba）宣传政治决策和主张，并听取民众意见。政府在颁布国家政策前，通常会广泛征求宗教领袖的意见，以减少政策实施的阻力。作为塞内加尔社会的“安全阀”^②，马拉布特和苏非兄弟会的存在使社会诉求有了释放的出口，有利于社会的良性运行，预防暴力冲突的发生。

第三，宗教领袖辅助政府管理社会事务、调解社会矛盾。伊斯兰教教义关注民众疾苦、社会公正等现世问题。宗教领袖借助其魅力和权威从古兰经教义和现代人权理念出发介入到社会事务的管理中。例如，塞内加尔于1999年出台了反对女性割礼法案。为了使这一法案被社会广泛认可并有效执行，塞内加尔伊玛目协会培训伊斯兰教长从宗教和科学角度向公众宣传女性割礼的危害，大大降低了塞内加尔女性遭受割礼的比率。^③ 另外，宗教领袖在处理

^① Donal Cruise O'Brien, 《Le “contrat social” sénégalais à l'épreuve》, *Politique africaine*, No. 45, 1992, p. 17.

^② Christian Coulon, 《Le Sénégal, développement et fragilité d'une semi-démocratie》, p. 610.

^③ Alfred Stepan, “Rituals of Respect: Sufis and Secularists in Senegal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44, No. 4, 2012, p. 388.

社会矛盾中扮演着调解者和仲裁者的角色。当民众和政府利益发生冲突时，宗教领袖作为调解者在稳定公众情绪的同时，为政府提供了政策调整的缓冲空间。例如，1968年爆发大规模社会运动时，桑戈尔总统借助宗教领袖的社会影响力平息动乱。2009年，塞内加尔政府为取缔药品非法销售决定关闭达喀尔一家市场，引发了商贩的抗议，在马拉布特的调解下政府最终决定调整了这一措施。^①与此同时，宗教领袖在调节社群间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社会冲突发生时，马拉布特通常出面进行调停。由于在民众享有较高威信，马拉布特比政府更能得到当事人的信服。宗教领袖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尤其是在政府难以覆盖的地区和事务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可见，传统宗教力量并没有因为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而被削弱；相反，它在民主化进程中得到了新的动力源泉和生存空间。它灵活的适应性使其在殖民时期以及民族独立后的民主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是殖民时期还是独立以来，马拉布特成为塞内加尔连接社会和政治统治的纽带。这种宗教的、间接的、非制度性的治理方式为中央统治权力提供了合法性，保障了政权稳固性。

（二）社会组织成为表达社会诉求、促进社会融合的重要渠道

19世纪末20世纪初，塞内加尔社会组织 and 政治团体在精英较为集中的沿海城市（主要为4个全权市镇）出现，并在20世纪40年代后逐渐扩大到农村地区。西化社会精英作为社会运动的领导人和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刺激了公民意识的形成和政治团体的出现，不仅为争取民族解放准备了思想和社会条件，也是塞内加尔独立后民主思想和运动较为活跃的历史原因。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推进、现代媒体的发展、公众文化水平的提高，社会组织日臻成熟，它们通过积极介入政治事务在该国民主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一，较早形成的公民意识和社会团体为独立后的国家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思想条件和实践基础。塞内加尔在法属殖民地中的特殊地位使该国较早形成了公民意识和社会团体。1695年，法国殖民者占领塞内加尔河河口的恩达尔岛（后建圣路易城）并从此侵入内地，侵占了西非的大片领土。1859年，

^① Mamadou Bodian et El Hadji Malick Sy Camara, 《Les religieux musulmans dans l'amélioration du débat public sur la bonne gouvernance au Sénégal》, dans Abdourahmane Seck et al. (dir.), *État, société et Islam au Sénégal, un air de nouveau temps?* Paris, Karthala, 2015, p. 121.

法国政府颁布法令建立法属西非联邦，并将总督设于塞内加尔。^① 19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国殖民统治者先后在塞内加尔设立法属西非仅有的4个“全权市镇”：圣路易、戈雷岛、吕菲斯克和达喀尔。其居民被视为法国公民，享有向法国议会选派代表、成立政治团体的公民权利。^② 公民权利的行使提高了塞内加尔本土精英和民众的政治参与感和权利意识。^③ 在1914年议会选举中，殖民地海关官员勃莱兹·迪亚涅（Blaise Diagne）被选为法国议会议员，成为第一个非洲本土议员，打破了塞内加尔政局由法国人和混血垄断的局面，法国政治机构成为塞精英接受现代政治早期熏陶和训练的平台。^④ 此后，塞内加尔著名政治活动家拉明·盖耶、桑戈尔、马马杜·迪亚等都曾担任法国议会议员职务。这些接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精英既是地方政府的代表，又是社会组织的核心力量。他们构成了“前政治网络”（Prepolitical Networks），^⑤ 在争取民族独立过程中积累了斗争经验和政治资源，成为民族独立的思想 and 实践先驱，为在独立后掌握国家机器的控制权积蓄了力量。

此外，与其他法属殖民地相比，塞内加尔成立政治团体的时间较早且数量较多。1908年，包括拉明·盖耶在内的一批接受西方教育的塞内加尔青年成立“圣路易曙光”（Aurore de Saint-Louis），这是塞内加尔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治团体。该组织于1912年更名为“塞内加尔青年”（Jeunes sénégalais）并于1914年支持勃莱兹·迪亚涅赢得议会选举。^⑥ 至1937年，塞内加尔已拥有42个注册工会和16个职业社团。^⑦ 二战后，根据1946年颁布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宪法，全权市镇以外的“臣民”也可享有公民身份，广大农村居民逐步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农村地区居民在本土价值和组织体系的

① 潘华琼、张象编著：《列国志·塞内加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62~64页。

② 闫波桥：《法国与塞内加尔“西非门户”地位的形成——基于长时段殖民史的考察》，载《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2020年第2期，第75页。

③ Alfred Stepan, “Stateness, Democracy and Respect, Senegal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Mamadou Diouf ed., *Tolerance, Democracy, and Sufis in Senega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212.

④ 潘华琼、张象编著：前引书，第72页。

⑤ [以色列]内奥米·哈占：《接触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社团生活》，载乔尔·S. 米格代尔、阿图尔·柯里、维维恩·苏主编：《国家权力与社会势力，第三世界的统治与变革》，郭为桂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01页。

⑥ François Zuccarelli, *La vie politique sénégalaise (1789-1940)*, Vol. 1, Paris, Publications du C. H. E. A. M., 1987, pp. 90-93.

⑦ Nicole Bernard-Duquet, *Le Sénégal et le Front populaire*, Paris, L’Harmattan, 1985, pp. 37-52.

基础上也陆续成立了现代农业行会等社团组织。

第二，社会组织成为表达社会诉求、监督国家权力的渠道之一。社会组织通常被认为具有“反权势”性质，即代表民众发挥制衡政府的作用。塞内加尔社会组织同样发挥着“引导和启发民众、监督国家权力”的作用。^① 塞内加尔独立后，为巩固政权的合法性、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国家建设，新生政权承认结社自由，允许民间社会组织合法活动。由于受法国民主政治和工会文化的影响，开国总统桑戈尔重视发挥工会在动员民众参与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允许和鼓励每个公民自愿加入工会组织。工会成为组织社会运动的中坚力量，但受到政府的严格管理。例如，1961年1月，塞内加尔全国工人联盟（Union 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sénégalais）成立，并于1968年5月组织了全国大罢工。为控制局面，政府逮捕了该工会联盟领导人，并于1969年成立了由执政党塞内加尔进步联盟领导的塞内加尔全国工人联合会（Con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sénégalais）。塞内加尔全国工人联合会与执政党保持着密切联系，成为唯一的全国范围的工会组织。^② 从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多党制的确立，政府放宽了对社会组织的监管和控制，政治氛围日趋活跃，为现代社会组织提供了更自由的发展空间，拥有更强自主性的行业商会不断涌现。又如，1989年创立的塞内加尔工商业从业人员联合会（Union des commerçants et industriels du Sénégal）代表了刚兴起的非正式经济从业人员利益，呼吁政府扶持中小型企业，反对政府向体制内的老牌企业提供优惠政策。90年代，受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影响，一批致力于维护人权、发展良治的非政府组织开始涌现，如非洲维护人权组织（Rencontre africaine pour la défense des droits de l'homme）、致力于清除腐败现象的公民论坛（Forum civil）等等。2000年瓦德总统上台后，塞内加尔政坛威权主义倾向日趋严重。为防止民主倒退，塞内加尔社会组织在巩固民主化成果方面发挥更多作用。社会组织的“反权势”特点日益突出，成为塞内加尔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制衡力量。当时，为抵制瓦德总统通过修改宪法谋求第三任期，非洲维护人权组织、公民论坛等非政府组织于2011年6月23日与反对党派共同发起大规模游行集会，被称为

^① 2014年8月29日，笔者在达喀尔对支持发展非政府组织委员会（Conseil des ONGs d'Appui au Développement）主席阿马杜·迪乌夫（Amadou Diouf）进行了有关塞内加尔政治发展问题的访谈。

^② Seydou Madani Sy, *Les régimes politiques sénégalais de l'indépendance à l'alternance politique (1960 - 2008)*, Yaoundé, Karthala et Crepos, 2009, pp. 317 - 320.

“六·二三运动”（Mouvement du 23 juin）。

第三，作为现代社会关系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组织有利于促进社会融合。团结互助是非洲社会传统价值观的主要特征。对于塞内加尔人而言，贫穷的定义不仅仅是物质的匮乏，而且还意味着社会联系的缺失。^① 随着社团网络的普遍化和多元化，社团组织为民众提供除家族、族群、宗教以外的归属感，成为建立现代社会关系的有效渠道，有利于巩固社会稳定。加入社团组织有助于个体增强社会联系，成为在新的环境中建立安全感、在危机中探寻自我救赎和发展的有效方式。例如，联合互助基金（Tontines）、共享午餐计划（Mbootay）等为塞内加尔民众提供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安全感，避免了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可能带来的社会割裂问题。^② 社团也是吸纳城市精英、青年毕业生以及部分失业人员，为其提供暂时的经济来源和社会归属感的平台。^③ 现今，几乎每个塞内加尔人都加入了社团组织，塞内加尔社会的“社团”特点增强了社会联系，提高了社会稳定性。

第四，社会组织成为国家实现政治控制、域外行为体施加政治影响的空间。社会组织不仅是社会力量的整合，而且成为重要的政治行为体。政治当权者常会通过拉拢工会等社会组织来吸纳社会力量，巩固社会基础，进而实现其政治目的。1983年，迪乌夫政府吸纳工会领导人马迪亚·迪奥普进入社会党领导层，以借助工会缓和社会矛盾。迪乌夫总统意识到社会党的公信力下降之后，试图拉拢社会组织提高在竞选中的支持率。瓦德政府执政初期，24个部长职位中的9个由社会组织的领导人担任，以期建立广泛的社会基础。最初以反对瓦德总统再次参选为目的的“六·二三”运动，也演化为候选人萨勒的总统竞选工具。^④ 可见，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较为模糊的政治生态中，社会组织成为当权者进行政治吸纳的对象，也是其成员踏入政治舞台的

^① Emmanuel Seyni Ndione, *Dynamique urbaine d' une société en grappe*, Dakar, NENA, 2015, p. 154.

^② Sheldon Gellar, *Democracy in Senegal, Tocquevillian Analytics in Afric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p. 106 - 107.

^③ 笔者在2014年实地调研中接触到的塞内加尔社会组织中也存在这三类人员。例如，公民论坛（Forum Civil）的志愿者有在职法律工作者和高校教师，其项目负责人在接受访问时是政治学硕士生，三年后成为国家公职人员。另一社会组织——支持发展非政府组织委员会（Conseil des organisations non gouvernementales d' appui au développement）的工作人员结构则趋于年轻化，多为还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

^④ Sheldon Gellar, *op. cit.*, pp. 87 - 88.

跳板。与此同时，由于国际机构在结构调整计划的引导下将经济援助与政治制度挂钩，通过向塞内加尔社会组织提供物质和技术支持传播自身民主理念和管理方式。国际组织或在塞内加尔创建社团组织，或将当地社团组织吸纳为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塞的分支机构。例如，于1993年创建的公民论坛致力于进行塞内加尔反腐败斗争和促进政府良治，该组织于2003年被吸纳为“透明国际”驻塞内加尔分支机构，加强了在打击政府腐败行为、监督跨国公司在塞经济行为等方面的国际合作。^①

总之，无论是宗教团体还是世俗的社会组织，对民主观念和制度持有开放态度，以自下而上方式参与民主化进程。它们一方面通过某种形式的斗争手段对权力进行监督，以体现其独立性；另一方面，渴望与权力联合，融入权力机构，以谋取现实利益。因此，社会组织既因其“反权势”的特点而具有革命性，又因其力量薄弱而存在妥协性。

三 内嵌的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

国家制度形塑着政治行为体和社会关系。同时，国家并不是在宏观社会变革中不受约束的原动力，国家被社会内在力量包围着并被其改变着，社会也同时被国家改变着。^② 在塞内加尔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了开放包容、和谐共处的政治与社会文化。

（一）政治精英的思想和实践塑造着开放包容、改革探索的政治文化

非洲国家非殖民化的过程是某些社会阶层获取国家统治权的过程，即从殖民国家手中接管对国家机器的控制权的过程。^③ 独立以来，国家治理道路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是在非殖民化过程中不同思想和政治力量碰撞和摩擦的结果。^④ 具体就塞内加尔而言，殖民教育的推广促进了一批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的出现。这些“西化精英”为探索独立后民主道路准备了思想条件。塞

① 2014年9月1日，公民论坛项目负责人巴卡里·马卢因·费伊（Bakary Malouine Faye）在与笔者的交流中，对该组织的主要活动进行了详细介绍。

② [美国] 乔尔·S. 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李杨、郭一聪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8页。

③ [以色列] 内奥米·哈占：前引文，第301页。

④ Kathrin Heitz, 《Décolonisation et construction nationale au Sénég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Vol. 1, No. 133, 2008, pp. 41 - 52.

内加尔国家政治道路的选择受拉明、桑戈尔、迪亚等主要政治领导人思想的影响，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也左右了独立后的政权性质。

1934年，政治活动家拉明·盖耶创立了塞内加尔第一个政党组织——塞内加尔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sénégalais）。拉明认为与殖民政府合作、配合法国同化政策是换取权利的有效手段。而时任法国制宪议会议员的桑戈尔则强调反对被动的同化政策，提倡团结农村居民和在农村颇有影响力的马拉布特。桑戈尔于1948年脱离社会党，并成立了塞内加尔民主阵营（Bloc démocratique sénégalais）。^①1957年，为赢得更广泛的社会支持，塞内加尔民主阵营吸纳了部分左翼激进主义知识分子，并更名为塞内加尔人民阵营（Bloc populaire sénégalais）。塞内加尔人民阵营在当年举行的领地选举中战胜了拉明领导的塞内加尔社会行动党（前身为塞内加尔社会党），桑戈尔成为塞内加尔民族独立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作为塞内加尔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人，桑戈尔认为完全独立将使塞内加尔丧失国家建设所必需的经济支持，提倡以建立联盟的方式实现独立，鼓励民众在1958年关于法兰西共同体的宪法草案的全民公投中选择留在法兰西共同体内，塞内加尔成为在法兰西共同体框架下的自治共和国，并与苏丹共和国（今马里共和国）成立马里联邦。

国家独立的方式和道路受政治领导人思想的影响，国家建构和社会转型道路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也受政治精英的价值观的左右。桑戈尔的政治思想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融合提供了价值导向和实践路径。独立初期，桑戈尔总统选择“一个民族、一个目标、一种信仰”（Un Peuple – Un But – Une Foi）作为国家格言，体现了其建设团结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意愿和决心。^②桑戈尔在任期间继续发挥其在农村地区的影响力，通过团结农村宗教领导人弥合广大农村地区和城市之间的差距。受法国社会主义政党的思想熏陶，桑戈尔探索出“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道路，并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推动下不断将其完善。他提倡维护宗教封建势力及国外大资本家的利益，主张在认清殖民主义剥削本质的同时，保持与前宗主国的政治经济合作。^③尽管桑戈尔在民族国家

^① 桑戈尔尽管反对接受法国的同化政策，但提倡从法国文化和价值观中汲取灵感和营养。因此，在桑戈尔的领导下，塞内加尔的独立道路是妥协性的，而非革命性的。

^② Gouvernement du Sénégal, 《Symbolique nationale》, <https://www.sec.gouv.sn/symbolique-nationale>, 2021-04-13.

^③ Gerti Hesseling, op. cit., p. 223.

独立运动中的改良思想受到左翼政党的质疑和批评，但是在独立初期为稳固新生政权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此外，桑戈尔通过“黑人性”（négritude）来概括黑人丰富多彩的文化传统和精神财富。“黑人性”的提出不仅将塞内加尔发展方向扎根于塞内加尔历史文化现实，而且大大激发起塞内加尔人民作为“黑人文化”组成部分的民族自豪感。

桑戈尔主张实行多党制的国家政治制度，认为多党制是体现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方面，有利于分化、控制反对党，活跃民主氛围。尽管桑戈尔领导的执政党在独立初期采取取缔反对党的措施来加强中央集权，实行一党制，但这一举措的主要目的是树立桑戈尔的政治核心地位，稳定政治局势，为探索适合国情的民主化道路创造时机。塞内加尔最终以和平渐进的方式实现了向多党制的转变，这一转变符合独立前业已形成的多党并存、各种思潮涌现的历史传统，也顺应了民主化的时代潮流。

桑戈尔以自身行动践行民主，其主动提前引退的做法为塞内加尔历任总统做出表率。迪乌夫继任后仍秉持桑戈尔政治方向，在进一步推动民主化改革的同时利用其专业背景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尽管瓦德时期出现较为严重的总统集权主义倾向，但是也在扩大政治民主、实现男女平权等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现任总统萨勒作为民族独立后出生的新一代领导人，锐意进取、勇于创新，通过协调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努力实现国家发展。可见，桑戈尔政治思想体系和人格魅力为塞内加尔政治发展奠定了开放包容的基调，塞内加尔几代领导人通过多次政治改革塑造着塞内加尔政治形态，总体上没有偏离民主开放的方向。

（二）相对统一的社会构成和国家政策的民主导向有利于形成和谐共处的社会文化

非洲大陆民族语言多样性突出，加之现代民族国家通常建立在殖民统治者划分的人为边界基础之上，语言、民族、宗教等身份认同要素成为非洲国家内部冲突的主要诱因。然而，塞内加尔历史上由身份认同问题引发的大规模冲突鲜有发生。93%的塞内加尔人将国家认同放在首位，或将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①，这与塞内加尔相对同质性的语言宗教构成和国家制度的民主导向不无关系。语言、宗教纽带有助于形成较强的民族认同

^① Alfred Stepan, *op. cit.*, pp. 379 - 401.

感、提高社会融合度，为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提供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倡导民族融合的语言宗教政策有助于形成较为统一的国家观念，营造和谐共处的社会氛围，避免因身份认同问题引起的社会分裂。

在民族方面，在被殖民之前，塞内加尔冈比亚地区便形成了多民族社会，不同族群间有通婚联姻的习俗，形成了文化交融的社会传统。当今，塞内加尔共有 20 多个民族，其中沃洛夫族占总人口的 43%，是塞内加尔第一大民族。在冈比亚河以北地区形成了以沃洛夫—伊斯兰为主要特征的民族文化。塞内加尔历届政府注重通过国家宪法和政府政策维护民族文化多样性，努力构建统一的民族认同，营造不同社群间平等包容的社会氛围。例如，宪法规定“保证所有公民无论出身、种族、性别和宗教，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禁止政党或政党联盟同化为某一种族、民族、性别、宗教、语言或地区”。此外，塞内加尔军队人员组成也注重族群之间的平衡，保持族群多元化。不同族群在军队内部的交融一方面有助于消除族群隔阂、培育对国家的认同，另一方面避免单一族群独大、与国家领导人形成庇护关系。^①

在语言方面，沃洛夫族所使用的沃洛夫语是塞内加尔最为通行的国家官方语言。将近 85% 的塞内加尔民众使用沃洛夫语进行交流，沃洛夫语是构成塞内加尔民族认同的主要元素。^② 相对统一的语言能够促进不同族群间的交流和共同文化属性的形成，进而避免族群冲突的发生。塞内加尔独立后，桑戈尔政府认为法语的使用和推广有利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规定塞内加尔的官方语言为法语。然而，较低的法语普及率（独立时仅 1/5 的人口掌握法语）限制了民众参政议政的可能性。反对派呼吁本土语言应享有和法语同等的地位。1971 年，塞内加尔政府认定 6 种本土语言为民族语言。现今，法语仍是塞内加尔精英在官方场合和文本中使用的语言，而沃洛夫语则是大多数民众日常交流使用的语言。为了拉近与民众的距离、更好地动员民众参与政治，政府注重将重要政府文件翻译成民族语言，将一些民主治理理念引入民族语言普及工作中。同时，政治领导人经常在公开演讲中混合使用法语和沃洛夫语。20 世纪 80 年代，法语“民主”（*démocratie*）一词被本土化，创造了沃洛夫语的“民主”

^① 此信息源于笔者 2014 年 5 月 7 日在巴黎对塞内加尔驻法国大使保罗·巴基（Paul Badji）的访谈。

^② Boubacar Boris Diop, 《Politique linguistique du Sénégal, d'hier à aujourd'hui》, dans *Enjeux 2019 - 2024, Sénégal, Réflexions sur les défis d'une émergence*, Dakar, L'Harmattan, 2020, pp. 143 - 152.

(demokarassi) 一词。^① 2000年,瓦德在总统竞选中以沃洛夫语“Sopi”(意为“改变”)为竞选口号,在青年选民中产生了强烈共鸣。在政治场合混合使用法语和沃洛夫语不仅有助于提高民众的政治参与感和认同感,而且有利于借助民族语言从本土文化中挖掘民主价值的根基,构建符合自身传统的政治和社会文化。

在宗教方面,伊斯兰教是大多数塞内加尔人的宗教信仰,但基督教徒作为少数群体充分享有信仰自由,其宗教节日和习俗得到广泛尊重。不同宗教信仰之间能够相互包容、和平共处,从未发生过不同宗教间(天主教与伊斯兰教)或不同教派间的冲突。自独立以来,塞内加尔就实行政教分离制度,宪法规定了共和国的世俗性,国家鼓励不同信仰者间相互尊重、和睦共处。塞内加尔政府所诠释和践行的政教分离制度既不倡导无神论,也不反对国家介入宗教事务,而是承认和尊重不同的宗教信仰,并向宗教信仰者和宗教机构提供财政和制度上的便利。“平等尊重、适度等距离”(equal respect, proportionate equidistance)是桑戈尔总统以来对待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每届政府试图在维护国家世俗性质的同时,鼓励不同宗教人士之间在公开场合展开对话,营造出包容开放的社会氛围。^② 虽然穆斯林要求政府对伊斯兰教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政策倾斜,但是以充分尊重天主教徒的权益为前提,包括穆斯林在内的绝大多数民众反对塞内加尔成为以伊斯兰教教法为主导的神权国家。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曾提出建立伊斯兰政权,遭到了苏非兄弟会领导人的反对。2001年,瓦德政府试图从宪法中剔除“政教分离”字眼,但是相关宪法草案最终因社会各界(包括伊斯兰宗教领袖)的反对而被否决。^③ 可见,宗教人士十分珍视宗教信仰自由的社会氛围,以维护国家的世俗性为原则,积极塑造不同教派之间和谐共处的社会文化,有效避免了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在塞内加尔的传播和蔓延。

四 结语

塞内加尔民主化进程表明,塞内加尔的政治发展之所以较为稳固,除了有效的政治制度之外,更根本的原因是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一定的

① Sheldon Gellar, op. cit., p. 134.

② Laura L. Cochrane, *Everyday Faith in Sufi Senegal*,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p. 42-55.

③ David T. Buckley, *Faithful to Secularism, the Religious Politics of Democracy in Ireland, Senegal, and the Philippin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106-132.

黏合度和张力，即伊斯兰教会、世俗社会组织等社会群体广泛地参与到国家建构和民主转型进程中，使得国家并非作为“外来物”嫁接于社会之上。而维持这种黏合度和张力的基础是国家与社会之间持续、有效的互动。在长期的互动实践中，塞内加尔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愿得以增强，形成了较为包容自主、以妥协共识为特征的政治文化。政治领导人和民众普遍认为民主程序和制度是处理公共事务的最佳方式，谴责损害“民主典范”的这一正面形象的行为并及时予以纠偏。

然而，民主化并非是单向的、不可逆转的过程，如何避免民主回潮仍是塞内加尔面临的挑战。2021年3月，国民议会议员、反对派代表奥斯曼·桑科（Ousmane Sonko）因性骚扰遭司法指控一事引发了社会骚乱并造成人员伤亡，最终发展成自萨勒总统2012年就任以来最大规模的社会危机。尽管这场社会骚乱得以平息，但它也暴露了塞内加尔民主政治的脆弱性和国家—社会互动机制的局限性。如何维护司法独立性、如何使社会诉求以非暴力的形式表达是塞内加尔政府为巩固民主政治应做出的努力。此外，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调整的是不同社会群体在争夺和分配国家政治经济资源中的矛盾。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放缓、国家资源的日益萎缩，达成共识和妥协的物质基础愈加脆弱。塞内加尔政府于2014年制定了“振兴塞内加尔计划”，旨在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经济转型，进而实现和扩大生产性财富的积累。^①该项举措将为塞内加尔经济发展注入活力，但经济转型也将催生新的变革性的社会力量。这些变革性的社会力量是否会撼动原有权力结构、威胁社会稳定，将是对塞内加尔现有民主政治韧性的重大考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阻碍了“振兴塞内加尔计划”的顺利实施，加剧了原有的社会矛盾，面临更多不确定性的青年群体组织游行示威表达不满。塞内加尔政府能否通过实质性改革继续赢得民众信任是塞内加尔保持其政治稳定性的关键。随着萨赫勒地区宗教极端主义的不断渗透，能否维持当前较为良性的政教关系、避免宗教问题政治化是塞内加尔政治和社会稳定所面临的又一挑战。而卡萨芒斯分裂主义运动是否会在经济下滑、政局变动的情况下再次浮出水面，将给塞内加尔的政治走向增添新的不确定性。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

^① Macky Sall, *Conviction républicaine, Discours sur le développement, Tome I*, Dakar, Editions Michel Lafon, 2018, pp. 192 – 210.